

# 今天我们如何研究现代化

■ 叶成城

现代化从来不是历史的遗迹，而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命题。理论研究可以强调深刻，但在实践中如此只会刻舟求剑甚至南辕北辙。只有聚焦机制，我们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具体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现代化的研究 从历史中的“取经”到现实中的“造桥”

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作为开头，某种程度上也隐含了对中国错过第一波现代化的遗憾。遭受第二波现代化浪潮冲击时，中国开始切身体会到了同近代工业国间的差距，近代中国面对的不仅是西方列强带来的倾销、不平等条约和鸦片，还包括“被现代化”的屈辱与迷茫。尽管如此，这场冲击至少唤醒了中国——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性之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斗争，也是一场艰难的自我革新。

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今天的崛起，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现代化远不止经济发展。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三十年战争后，国家现代化是一个“竞逐富强”的过程，土地、资源和市场的竞争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零和性。无论是19世纪的殖民扩张，还是20世纪的全球化浪潮，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在一个被其他国家深深塑造的世界中，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因而我们的现代化研究采用了“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试图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理解现代化的复杂性，聚焦三个变量：外部冲击、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这一情况下现代化的机制可以概括为，在外部冲击下，改革派在权力斗争中战胜利益集团，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高效地实施新政，最终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富国强兵。

外部冲击(如大西洋贸易、技术革命或对外战争)可以视为一个情境变量，因为如果不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就无法理解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这两个变量的涵义。国家能力是指政府执行政策、推动改革、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国家能力往往是成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中央政权，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也无法应对残酷的国际竞争。例如英国和普鲁士具有强国家的传统，依靠中央政权的执行力可以使国家有效动员资源，为工业化和制度变革铺平道路。现代化早期的

“现代化”这个词听起来像是过气的流行语。从20世纪中叶的大热，到冷战后的冷却，这一概念似乎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变成了民主化、工业化、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等各种“小词”的集合。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维度，至少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四个层面，每一个国家不同维度的现代化进程是不一样的，既有可能是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先行，也可能是先有政治层面的制度性变革，但只注重于一个维度的国家通常无法走远。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罗·阿西莫格鲁等人那样，西方学界已经很少研究“现代化”这个宏观话题，而是着手于研究技术和制度等具体要素所带来的发展差异。这种趋势在定量方法普及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指标远比“现代性”更容易测量，而基于小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更容易被“国际顶刊”所接受。但现代化的课题并未过时，反而比以往更加重要，它不单关乎学术兴趣与品味，更是理解近代人类历史和国家命运的钥匙。试想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语境，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崛起的漫长转型，又如何看待英国从16世纪的西欧边陲走向全球霸权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的视角依旧可以为今天深陷不平等、冲突和变革的世界带来新的启示，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问，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

## 现代化的情结 未竟的事业与持续的追问

现代化的故事，从来就没有终点。它既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我们时常要问，为什么一些国家能成功实现现代化，而另一些国家却会失败？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如何复兴过去的辉煌，最终实现现代化。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以



英国画家威廉·透纳是19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生活在工业革命的顶峰时期，有多幅探索自然与人类工业关系的作品。

图为《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1844) 现藏英国国家美术馆

## 现代化的方法 从“因素”到“机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领域出现了“哥白尼革命”，实现从因素分析到寻找机制的巨大进步。现代化研究亦复如是。基于因素的回归分析无法理解现代化背后的复杂进程，例如认为现代化源于地理禀赋、制度优势、文化传统等个别要素；对具体事件的细节描述仍然缺乏对现象背后规律的深入探讨。社会科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能够透过表象挖掘出深层原理，而因果机制的优势在于实现对过程的理论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机制的经济方法不能“经邦济世”，没有机制的历史视角难以“以史为鉴”。

社会科学研究注重将复杂的历史现象解构为相互作用的变量，并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

利益集团往往是指那些掌握资源和话语权的贵族、地主或宗教势力。为了保护自身的封建特权，他们在决策阶段的阻挠、动员阶段的抵制、执行阶段的歪曲，都会阻碍新政的施行。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阶层对改革的强烈抵制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爆发革命；而在普鲁士，经济和政治改革则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支持，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之一。

然而，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的作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重合的，而是通过一系列机制进行互动。当外部冲击到来，如一国具备较强的国家能力，同时利益集团对中央政权的渗透较弱，那改革的成功概率就会显著地提高。相反如果国家加上强大的利益集团，则容易让现代化进程出现长期的动荡(如法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如荷兰和奥地利)，则无法有效推动现代化变革和工业化，也很难适应日趋激烈的大国角逐。

# 一位报人的《资治通鉴》读法

■ 何安平

为读者者之最上乘，亦即读《通鉴》者之唯一要诀也。”又列举了《通鉴》中善读书的善、最不善读书的萧绎、忌人读书的仇士良。此后作者分为18类归纳《通鉴》的内容：帝王与纪年、封建与郡县、政治、军事、知人与用人、儒术、党锢、游佚、清谈、释教、道教、神仙、封禅与郊祀、灾祥图讖与迷信、工程与建筑、女后、宦官、四裔。最后一部分是《资治通鉴》外纪读法》。在每一类下，作者都列有“备查”一项，注出了文中所引事件在《通鉴》中的具体位置。在作者的设计中，应该还有《通鉴纪年与西历》的附录，但是最终出版的书中并没有。

《读法》的结构和现在流行的《通鉴》导读类通俗读物不同。大部分《通鉴》通俗书都会先介绍司马光及其编写团队，再概述《通鉴》的内容、相关的衍生书籍等，主体部分是《通鉴》的缩写，虽撰作形式不同，但寻其渊源，与明清时流行的《廿二史札记》、《因事类》、《各成派属》。此外，专就《通鉴》读法来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针对《资治通鉴》说：“若苦于枯燥无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门类，标注摘记作将来著述资料。”王缙尘可能受其影响，其实在本书中

有自述，称是效韩愈“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的方法，就具体操作看，属于说法各异，本质相同。《读法》的分类式体例，对读者而言可以直观感受到《通鉴》包含的各方面及其重点所在，避免了对《通鉴》内容的复述，因为如果只是浓缩《通鉴》记事，读者完全可以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或许更为清晰便利，不一定非要读《通鉴》的故事。

《读法》所分18类，详略不一，大体是前详后略，尤其是政治、军事内容最多，这符合《通鉴》以政治史为主的实际情况，其中军事部分最能体现作者提要钩玄的功夫。“军事”类从秦并六国谈起，历述重要战争，以后周王孙策《开边策》结束，核心是分析战争中兵法的应用。如关于澠水之战，作者认为是中国历史南北战争中两大战役之一(另一为赤壁之战)，《通鉴》对此记载尤为精彩，相较而言，澠水之战比赤壁之战更复杂，头绪纷繁，故叙事难度极大。王缙尘先叙述《通鉴》所记战争经过，然后展开分析，以为秦军本有必胜之道，具体指出了必胜之道的四个方面和最终战败的四个原因，经此分析，自然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此次重要战役。政治军事虽然是主体，但从分类也可以看到，作者视野宽广，兼顾到了《通鉴》中的其他方面，这对读者全面认识《通鉴》的内容也是有益的。

从王缙尘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所以《读法》中常会把古代和当代相连接，通过古代认识当代，也通过当代去理解古代“政治”中

王缙尘，与其兄王余都是有名的报人。他亦勤于著述，有多部著作出版。1936年《学术世界》第二卷第一期有陈松英撰写的小传，可略知其生平：“王子澄先生，名缙尘，浙江绍兴人，年五十七岁，少患八股，不事科学。清末在绍兴创设《白话报》及《阅报社》，又设农事试验场、女工传习所。民国元年在上海发行《新世界》杂志。三年任绍兴《禹域新闻》总编辑。四年至十五年任杭州《城江日报》评论及小说。十六年任国立浙江大学秘书处。二十三年来沪寓同孚邨梓芳阁，专事著述。撰《资治通鉴读法》《国学讲话》。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撰《四书读本广解》等书。”《白话报》即《绍兴白话报》，是绍兴第一家报纸，主要创始人是王子余，王缙尘是重要参与者；《阅报》当作《越报》。除小传所列著作外，现可知还有《陶渊明先生评传》一部(与《陶渊明全集》合册出版，国学整理社，1936)，又编校过《郑板桥全集》《国学整理社，1935)。另外王缙尘在推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方面也有贡献，如在1912年《新世界》第2期发表《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署名：势仲译述、燕尘重治。燕尘即王缙尘)，1936年至1937年在《学术世界》连载四篇《儒家社会主义》，则是“将儒学中所陈社会主义之理论，抉而出之”。

在王缙尘的诸多著述中，《资治通鉴读法》作为导读《资治通鉴》的通俗读物，现在看来依然有其价值。

《读法》由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发行，冠以苏湘序文和作者自序，正文内容首列《资治通鉴读法》，重在介绍《通鉴》的价值。读法方面，认为读者应该师法书中所记的圣贤豪杰，取长补短，“此

持，在这一波浪潮中脱颖而出。

其次是第一波半现代化(1700—1789)，现代化的外部冲击是英国优势确立后的启蒙运动以及竞争加剧所带来的普遍性财政危机。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效仿英国，但结果差异显著，体现了初始权力结构在改革成败中的关键作用。普鲁士由于强国家和弱势的贵族，顺利通过政治、经济和财政改革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国则因利益集团的阻挠爆发革命。

最后是第二波现代化(1789—1848)，工业革命(尤其铁路与电报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危机成为重要的外部冲击，现代化浪潮开始扩散到欧洲之外。在“帝国的共鸣”之下，1848欧洲革命浪潮让多数西欧国家挣脱了旧制度的束缚，例如丹麦、比利时、荷兰依靠强国家和弱利益集团的传统巩固了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依旧动荡，奥地利和撒丁王国则仅实现了有限的改良。

## 论衡

### 东亚的现代化 一条独特的路径

在东亚，1840年是鸦片战争和半殖民地的开端，殖民者的到来成为东亚现代化的“外部冲击”。不同于欧洲以内部累积为主导的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最初是“被迫”的，是在外部力量的强烈刺激下展开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工业品倾销、资本掠夺甚至鸦片的毒害，迅速瓦解了东亚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秩序。这种外部冲击给东亚带来深重的苦难，但也迫使东亚国家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与危机，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现代化尝试。

东亚的现代化虽然起步较晚，但同样可以借助上述“因素+机制”的视角加以分析。日本是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案例。得益于其历史上的“强国家+弱利益集团”传统，日本在应对外部挑战时，能够迅速调整体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推动了工业化为代表的部分现代化进程。然而，由于政治制度不成熟，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的泥潭，直到二战后的第三波现代化浪潮中才真正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更曲折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起初步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转折点，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实现了高速增长，最终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波半现代化浪潮中成为世界主要强国。

需要看到的是，二战后东亚现代化的成功并非单一国家的努力，而是区域内国家间相互作用、协同推进的结果，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现代化的重要中心，开辟了一条结合本土条件的道路。东亚的成功证明，现代化无需依赖西方模式，也能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

### 现代化研究的启示 从机制中寻找未来之路

西方学者往往强调产权保护、代议制民主、自由贸易等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拉美、中东和非洲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单纯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经常以失败告终，忽视本土实际条件的制度设计很难奏效。因此，现代化研究的意义在于提炼出因素和机制，并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情境。

现代化从来不是历史的遗迹，而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命题。理论研究可以强调深刻，但在实践中如此只会刻舟求剑甚至南辕北辙。只有聚焦机制，我们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具体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未来的探索，真正重要的不是模仿某一模式，而是根据时空情境和初始条件来构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缙尘不是专业历史学者，但对《通鉴》他自言“曾从事数度之研究”，所以《读法》对《通鉴》信手拈来，作者又长期撰写报刊文章，长于为文，所以《读法》对史料剪裁得当，语言畅达，读之不觉沉闷，其中所提的一些个人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读者可以不认同，但也是一种促进思考的方法。

从《通鉴》学史的角度看，《通鉴》由于卷帙浩繁，又是编年史的题材，阅读难度较大，因此司马光说书成之后只有王胜之借读一遍，其他人未读完一卷，已欠仲思睡。所以后来出现不少节本，但节本普遍质量不高，不适合现代人阅读。近现代以来，较早的《通鉴》研究著作主要有两部，即崔凤秋《通鉴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和张颉《通鉴学》(开明书店，1948)，特别是张颉，学术价值颇高，但对一般读者而言或许过深。近年来，新出版了不少通俗类《通鉴》导读书籍，改变了这一现状，但如上文所述，《读法》的结构、内容、理念等与之都不相同，所以时至今日，它除了学术史的意义外，仍然是一部值得阅读的书籍。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资讯 乐观的莱布尼茨

■ 编译/黎文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读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了。而他是位“旷世奇才”：发明了微积分，构想出现代计算机，涉猎多个领域并几乎都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还提出“现存世界是上帝所能创造的最好世界”这一著名论断。近日，德国思想史家迈克尔·肯佩的《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世界：莱布尼茨的关键七天》(2022)英译本出版。对于多面手天才，传记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了他生命中的七个瞬间，为这位遥远人物注入生命力，由此揭示他对现代世界的贡献。

1675年10月29日，我们发现莱布尼茨在巴黎的床上，在海量笔记中孜孜不倦工作，于纸上写下积分符号——他的微积分的基础。1696年8月13日，在汉诺威的海伦豪森宫，他与聪明的选帝侯夫人索菲亚辩论。1703年4月17日，他在柏林写信，报告一位住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发现了如何使用他的二进制系统破解中国古老的文字体系。1714年8月的一天，莱布尼茨一边品尝维也纳咖啡，一边在本体论、生物学和数学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

莱布尼茨有专论、散文、书信和大量未出版的档案，却没有一部巨著。狄德罗曾感叹如果莱布尼茨的思想“能像柏拉图那样表达出来”，影响将不遑多让。

莱布尼茨早年以古人为师，但他反对将“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对立起来，并试图调和二者。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开始服务于美因茨选帝侯，其间创作了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作品。在巴黎的四年，他接触到笛卡尔哲学和帕斯卡尔数学，遇到了马勒伯朗士和斯宾诺莎。他是启蒙运动早期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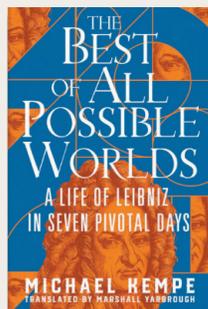
1673年，美因茨选帝侯去世，莱布尼茨受雇于汉诺威选帝侯，并在那里度过余生。这位哲学家兼任了国家顾问和宫廷历史学家。他的工作量大得惊人。他与1000多位同仁通信，撰述的主题包含宗教(《神正论》，1710)、认识论(《单子论新论》，1704)和本体论(《单子论》，1714)等。

莱布尼茨是个系统构建者，他“洗劫”了不同的哲学传统，加入自己的创新。他接受了新科学的“机械化”宇宙，认定数学是这个宇宙的语言。但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不同的是，他并不信仰纯粹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因此构造出有别于物质原子的“单子”，每个单子都拥有感知物质。他认为现实并不存在于被感知的物质中，而是存在于感知者的头脑中。有趣的是，多变的莱布尼茨同时也是未来学家和技术专家。是他提出了现代运河的构想，还有潜水艇和导航机器人。作者肯佩说，莱布尼茨很容易受到“进步的兴奋”的影响，不断地在计划中引入了。

肯佩巧妙介绍了莱布尼茨发展无穷小微积分的方法和符号，我们今天这个工程化、量化的世界即以此为基础。用无限小的数值进行运算，用公式来表达在需要几何图解的运算——这绝对是令人目眩的突破，也由此激发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和对人类理性的信心。

莱布尼茨渴望用符号来表达人类的知识，然后将“组合分析”应用于所有科学。“不要再争论了，让我们计算吧！Calculamus!”对莱布尼茨来说，数学提供了一把通往人类灵魂和上帝思想的钥匙。他相信上帝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理性的。世界是一个完美存在的造物，它只能达到“最佳可能”的状态。

莱布尼茨“神正论”的关键在于创造的对称性。有最好，才有所谓最好；有丑才有美；有不和谐，才会有和谐。最好的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优化的。这些论调看上去对苦难漠不关心。但肯佩认为，更“务实”地来看，他是希望增强人类的乐观主义，同时也增强我们努力去实现、进步的决心。最好的世界需要我们努力去实现，而不是一味地接受现实。莱布尼茨要求“人类参与到底追求完美的工作中”。



文匯学人  
第611期